

全球智库半月谈

稀土：下一场贸易战的诱因？

欧洲联合的 20 年

中国经济在减速，但不是因为贸易战

中美货币战争：过去和现在

货币战争会检验全球经济恢复力

财富税：议题综述

跨境合作在银行监管中的有效性

本期编译

刘铮

李陆屿

申劭婧

宋海锐

吴泓蓁

熊春婷

张子萱

张舜栋

张寒堤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承担的编译项目，每半月定期发布。所有稿件均系网络公开文章，由项目组成员依据当前热点编译组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组

顾问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 斌		姚枝仲	
团队成员	曹永福	美国经济	陆 婷	欧洲经济
	冯维江	日本经济	熊爱宗	新兴市场
	徐奇渊	中国经济	杨盼盼	东盟与韩国
	肖立晟	国际金融	李远芳	国际金融
	常殊昱	跨境资本流动	顾 弦	大宗商品
	陈 博	大宗商品	吴海英	对外贸易
	崔晓敏	对外贸易	熊婉婷	金融政策
	王 地	宏观经济	张寒堤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 长	张宇燕			
召集人	徐 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 吴泓蓁 邮箱: cinderella_wu97@sina.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4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稀土：下一场贸易战的诱因？ 6

今年5月，在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列入黑名单一周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观了一家稀土加工企业，他强调了稀土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这一声明被广泛解读为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自那以后，中国政府机构和官方媒体都表示，随着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紧张的经济局势持续升级，中国准备继续应对这一威胁。随着贸易战从关税问题转向货币问题，稀土很可能成为下一场贸易战的诱因。

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获得贸易优惠待遇 10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享受了优惠待遇，特朗普对此表示不满，甚至以退出WTO为威胁。笔者认为，所谓优惠待遇定义不明、应用效果虽谈判情况多变，因此不能说明优惠与否。同时，各国应当认识加强合作才是符合自身以及全球利益的。

全球治理

欧洲联合的 20 年 13

在欧元诞生20周年之际举办了2019年辛特拉央行论坛，其中，欧洲货币联盟迄今的经验及其未来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会议的核心。本文强调了本次讨论的一些要点，包括经济趋同的多样化进展以及它与产业地理集聚的关系、在尚不完整的货币联盟中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中的关系等，并指明了欧元区未来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

聚焦中国

特朗普对中国关税：你需要知道的 5 件事 21

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有关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摇摆不定的消息一直让人目不暇接，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消费者的困惑。8月13日，政府正式发布了新关税计划，将在今年秋季和冬季逐步生效。推迟推出新关税以避免零售购物旺季的情况，可能表明特朗普总统正计划维持其关税。

中国经济在减速，但不是因为贸易战 25

特朗普称加征关税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首先，美国和纳税人承担了关税负担。第二，早在贸易战之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放缓，原因主要是中国的企业政策和去杠杆。中国经济也并不十分依赖对美出口。

中美货币战争：过去和现在 28

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一项纯粹的政治行动,我们可以认为就汇率问题上,美国在对中国宣战。特朗普总统提高中国关税后,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基本面受到影响,这样看来,操纵汇率的究竟是中国还是美国?当前,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亚洲货币战争。

经济政策

财富税-议题综述 30

财富税是一个在某些欧洲国家存在的税种,但在美国还没有。今年1月,美国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提议对7.5万户财富超过500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财富税。虽然每年2%到3%的税率看似很低,但实际上这相当于高税率的所得税。由于美国财富的不平等分配,财富税的税收规模将会很大,甚至减少国民储蓄和投资;财富税还面临纳税人故意隐瞒资产或压低资产价值的问题;它也将面临合规性和行政挑战,甚至可能被裁定为违宪,因为美国的直接税必须由各州分摊。当前的政策环境下,任何对收入、遗产和赠予有关的税改都必须谨慎。

货币战争会检验全球经济恢复力 32

在新版的北美贸易协定当中,添加了“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事宜”。该条款规定任何签署方都不得通过干预外汇市场进行竞争性贬值,如有违犯,则需由受害国与被指控的违反国进行双边协商解决争端。如今美国正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货币战争,如果新版北美贸易协定生效,加拿大和墨西哥将不得不遵循条款内容,做出对中国不利的政策措施。

跨境合作在银行监管中的有效性 36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在银行监管方面的合作力度明显加大,最典型的例子是欧元区实行单一的监管机制。然而,监管合作是否有助于改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目前来说尚不明朗。本文使用大量跨境银行样本的面板数据,检验监管合作是否与银行稳定性的提升相关。研究发现,监管合作是有效的,但对那些给金融稳定带来最大风险的大型银行来说,效果有限。

战略观察

英国议会休会与脱欧进程 40

8月28日,鲍里斯·约翰逊首相正式向女王提出申请,要求英国议会进入长达一个多月的漫长休会期,这一提议迅速引起了轩然大波。这项提议意味着什么?英国能否在期限到来之前完成无协议脱欧?作者给出了分析。

本期智库介绍 42

稀土：下一场贸易战的诱因？

Grace Hearty & Mayaz Alam /文 熊春婷/编译

导读：今年5月，在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列入黑名单一周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观了一家稀土加工企业，他强调稀土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这一声明被广泛解读为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自那以后，中国政府机构和官方媒体都表示，随着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紧张的经济局势持续升级，中国准备继续应对这一威胁。随着贸易战从关税问题转向货币问题，稀土很可能成为下一场贸易战的诱因。具体编译如下：

问题一：稀土是什么？它们有什么用途？

回答一：稀土元素是由17种金属组成的一组元素集合，包括元素周期表上的15种镧系元素，以及具有类似化学性质的钪和钇。稀土作为多种先进产业的投入品，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LED显示屏到武器系统，这些元素无处不在。例如，钕和钐是电视机的关键部件，钕和钐用于制造精确导弹和智能炸弹。

问题二：稀土是如何生产的？在哪里发现的？

回答二：尽管他们的名字另有所指，但是稀土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稀缺资源。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说法，它们“在地壳中含量相对丰富”。它们之所以“稀有”，是因为它们不能以单独的形式存在，而是作为更大矿物的一部分组成而存在，这使得开采成本高昂。在稀土元素可以用于商业或军事用途之前，它们需要经过几个阶段的复合，这对环境污染严重，而且加工费用高昂。稀土氧化物是从中国的Bayan Obo或澳大利亚的Mount Weld等矿床开采出来的，然后通常是在不同的设施中进行化学分离。之后，企业购买这些加工过的金属作为高科技设备的零部件。

中国在稀土生产的各个阶段都处于领先地位，而且随着生产向下游转移，其主导地位不断增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储量，估计占全球总量的37%。越南和巴西各占全球外汇储备的18%左右，美国占1.17%。中国企业控制着整个稀土供应链85%以上的高成本加工阶段，并在2018年生产了全球70%以上的稀土金属。然而，随着其他参与者进入(或重新进入)这个市场，这一比例与2009年惊人的97%相比而言已是大有降低。澳大利亚和美国去年分别是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稀土供应国，各自生产了全球约12%和9%的稀土元素。

问题三：稀土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

回答三：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间，美国是世界上稀土元素的主要生产国，但在 2014 年至 2017 年间，美国有 80% 的稀土从中国进口。美国国防部表示，这一重大转变并非巧合，而是中国政府“战略性”的涌入全球稀土市场所导致的结果。由于政府的支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较为宽松的环境标准，中国的稀土得以崛起。1987 年，中国前主席邓小平曾说过一句名言：“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这预示着中国确有利用其对该行业供应链的影响力的意图。

中国也曾将稀土“武器化”。2010 年一艘中国拖网渔船与一艘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在争议岛屿附近相撞后，中国政府削减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此后，日本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在国内投资研发，以及在印度和澳大利亚进行投资—实现了稀土供应多元化。到 2017 年，越南已成为日本最大的稀土供应国。

作为中美贸易战的一部分，中国在今年早些时候对 MP 材料公司开采的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MP 材料是美国唯一的稀土生产商，也是加州 MP 矿产的运营商。上周中国稀土工业协会表示，准备将稀土武器化，以便将更高的成本转嫁给美国消费者。

问题四：美国将如何回应？

回答四：在习主席视察江西稀土工厂几周后，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一份报告，概述了六项行动呼吁，并誓言美国将“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确保“关键矿物元素”的供应，包括 17 种稀土元素。建议包括加快矿业许可证的监管审批程序、增加研发投入、增加国内供应、发展稀土知识以及扩大与盟友的贸易。

特朗普总统要求国防部增加稀土磁铁的产量，随后澳大利亚国防部宣布也将增加产量，以确保本国及其盟友的供应。这个问题在美国国会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参议员们提出了一项法案，将增加研究经费，以确定是否可以从煤炭中提取稀土，同时还提出了一项立法，允许美国企业组建一个不受反垄断法约束的合作组织。分析人士表示，美国政府加大资助对稀土替代品的研究，正如中日发生争执后的日本政府所做出的行为。

矿业公司已经在为“稀土金属贸易战”做准备。明年 MP 材料公司将在 Mountain Pass 开设一家稀土加工厂，这也是美国唯一一家稀土处理厂。预计到 2020 年国内将会有更多的矿山和加工厂。澳大利亚主要稀土生产商 Lynas 公司与总部位于美国的 Blue Line 公司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在德克萨斯州建立加工厂。此外，德州矿产资源公司(Texas minerals Resources Corp.)希望开发得克萨斯州西部的圆顶(Round Top)稀土矿，并正在游说美国政府要求国防承包商仅从美国工厂采购稀土。未来更好的将美国与由中国控制的这个关键市场隔离开来，建立国内稀土供应只是该计划的一部分。

本文原题为“Rare Earths: Next Element in the Trade War?”。本文作者 Grace Hearty 和 Mayaz Alam。Grace Hearty 是华盛顿特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政治经济学西蒙主席的副主任，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政策与贸易、重点关注亚太地区相关问题。Mayaz Alam 是政治经济学西蒙主席的研究实习生。本文于 2019 年 8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获得贸易优惠待遇

Anabel González / 文 吴泓慕 / 编译

导读：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享受了优惠待遇，特朗普对此表示不满，甚至以退出WTO为威胁。笔者认为，所谓优惠待遇定义不明、应用效果虽谈判情况多变，因此不能说明优惠与否。同时，各国应当认识加强合作才是符合自身以及全球利益的。全文如下：

特朗普总统认为，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正在通过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而不公平地利用全球贸易体系。最近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演讲中重述了他的抱怨，并以离开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威胁。根据一份内部文件，特朗普认为，这些国家通过将自己定义为发展中国家，他们能获得优惠的市场准入、出口补贴的使用以及其他不应得的福利。他的行政团队将起草一份排除了这类国家的名单。如果这些国家不同意，它将不再将它们视为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

实际上，美国正在为中国设一条“无牙犬”，进一步侵蚀了多边秩序中以规则为基础的性质。美国不能信服其他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容忍这个规则，因为它会撕裂全球贸易体系。

对于这些特朗普的批评，你也许会成为WTO的发展中国家是一种的特权，其实并不是。按照世贸组织的说法，发展中国家确实可以获得“特殊和差别待遇”（SDT）的灵活性，但SDT可以带来什么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作为谈判商议的结果，它的内容由每个协议的语境决定。

典型的SDT包括优惠市场准入、技术援助，或允许特定规则和自由化承诺的特例情况。现有世贸组织协定中的一些条款仍然具有相关性，但许多条款并非如此。例如，发展中国家适应新规则的较长过渡期已经几乎到期。无论如何，这些灵活性不能单方面改变。他们必须在谈判中达成一致。因此，对于那些“不恰当地”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白宫对其威胁撤回SDT，但大多是空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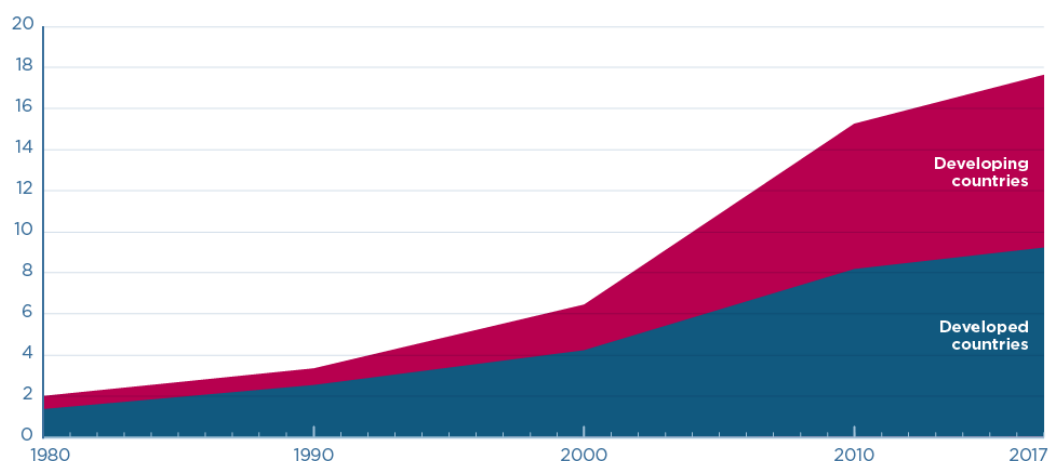
“发展中”国家地位所产生的灵活性主要适用于较小和较贫穷的国家，这些国家可能需要此来实施协议，并攫取利用国际贸易的机会。但有关“特殊和差别”利益的整体有效性的证据不一：由于缺乏互利参与的谈判，发展中国家通常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部门（如农业或服装）受到持续的限制。由于有时未能获得协议中的互惠承诺，发展中国家错失了国内改革以融入全球市场的机会。

当前真正的问题是多边规则的角色问题，其在规范各国在国家层面采取的政策和行动方面，会对国际市场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当大多数国际贸易在发达国

家之间进行时，规则的应用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已经增长到世界总量的近一半（见下图），其中最大的 15 个发展中经济体占其中约四分之三的股份，他们的行动也会影响全球市场。因此，由于它们的政策影响国际市场，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让所有较大的经济体遵守多边商定和应用的规定。

Expor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grown to almost half of total world exports

Merchandise exports, billions of dollars



Sourc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但是，特朗普政府试图将较大发展中国家全部纳入全球贸易体系，但破坏系统本身并不能行得通。由目前与中国的对抗表明，双边抗衡也并不有效。虽然在未来几个月内极不可能发生，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是参与、建立联盟并进行谈判。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所有参与者都会明白这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全球经济的利益。

本文原题为“Should Developing Countries Get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n Trade?”。本文作者 Anabel González 自 2018 年 10 月起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她曾担任世界银行贸易与竞争力全球实践（2014-18）的高级主管，负责领导世行的贸易，投资环境议程。本文于 2019 年 8 月刊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洲联合的 20 年

Philipp Hartmann, Glenn Schepens /文 申劲婧/编译

导读：在欧元诞生 20 周年之际举办了 2019 年辛特拉央行论坛，其中，欧洲货币联盟迄今的经验及其未来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会议的核心。本文强调了本次讨论的一些要点，包括经济趋同的多样化进展以及它与产业地理集聚的关系、在尚不完整的货币联盟中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中的关系等，并指明了欧元区未来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编译如下：

2019 年 1 月是欧元诞生 20 周年。因此，在欧洲央行 2019 年辛特拉论坛上，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市场经济学家回顾了欧洲货币联盟（EMU）的创始理念，对 20 年来积累的经验以及决定欧洲货币联盟未来成功的关键因素和政策进行了讨论。本文将讨论的主要问题总结为三个主题：对欧元区国家趋同经验的不同看法、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演变和作用及它们可能如何影响 EMU，以及人口变化对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所有的会议文件、演示和录像都可以在欧洲央行网站上找到。

欧元区的融合、集聚和增长

与货币联盟，特别是欧洲货币联盟的适当运作有关，且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是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趋同程度。例如，关于最佳货币区的文献（见 Mongelli, 2002 或 Dellas & Tavlas, 2009）突出表明，不对称冲击使宏观经济调整在货币政策统一时具有挑战性，并且只能在全区范围内平滑商业周期。根据一些增长和经济发展文献（如 Barro & Sala-i-Martin, 1992 及 1997 年调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向高水平趋同，无异于均匀地分配货币联盟的利益。

Jean Imbs 采用了推测观点，尤其适用货币政策。在前 20 年中，他发现 GDP（另见 Draghi, 2019）有显著的西格玛收敛（即同等对待上升和衰退时的跨国同步），2013 年后 EMU 12 个早期成员中的消费增长国家尤其如此。基于对投入-产出表中所记录的供应链分析，该文献的一个主要贡献是，欧元区国家的总体“出口强度”在解释 GDP 收敛时与直接贸易一样，甚至更重要。请注意，“出口强度”还包括向这一国家出口导向的部门提供投入，但本身不进行大量跨境贸易的上游部门，例如，运输、酒店或商业服务等服务在投入部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欧元区 GDP 的同步反映了一种没有货币联盟，世界其它地区不可能出现的深刻的一体化形式。

Sebnem Kalemlı-Özcan (2019) 在辛特拉的讨论中补充了人均 GDP 水平的结构观点，即侧重于各国迎头赶上，从低水平走向高水平的所谓的贝塔收敛。它最近受到广泛关注，因为 2007 年之后加入欧元区的许多新成员国表现出与欧元区平均水平的显著趋同，而来自南欧的一些初始成员国则表现出与平均水平长期分

离趋势（如 Sondermann 等，2019：图 2）。Diaz del Hoyo 等人（2017 年）认为，后一类国家缺乏趋同的主要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逐渐下降，这种增长早在它们引入欧元之前就开始了。

由于不同国家集团的不同趋势相互抵消，Kalemli-ázcan 发现，一旦控制了人口因素或教育等标准增长决定因素，欧元区各国的实际人均 GDP 水平既不存在赶上现象，也不存在分离。然而有趣的是，将各国分区域观察情况会发生变化。在区域一级，明显的证据表明，平均而言，欧元区较贫困地区赶上了较富裕地区（表 1）。然而，正如提交给 2019 年 4 月 ECOFIN 会议的 Bruegel 文件所强调的那样，依然存在区域趋同相当不平衡的现象。法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许多地区表现不佳（Demertzis 等，2019：图 4）。

表 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较低的欧元区地区追赶（贝塔收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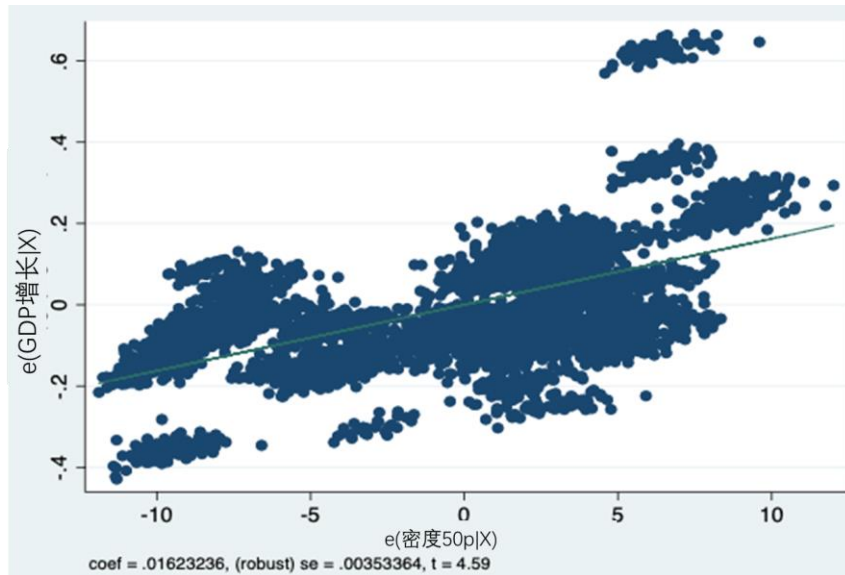
	(1)	(2)	(3)	(4)	(5)
	2000-2014			2000-2007	2007-2014
β	0.0057**	-0.0080***	-0.0096***	0.0087***	-0.0096***
	(0.0025)	(0.003)	(0.0025)	(0.0031)	(0.0034)
出口密度	Y		Y	Y	Y
国家固定效应		Y			
N	113	113	113	108	124
R ²	0/239	0.372	0.789	0.646	0.993

来源：Kalemli-Ozcan（2019），图表 1

展望未来，影响欧元区未来（区域）经济趋同和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产业结构在地理上如何聚集。想想美国的硅谷，以及决定其生产潜力的初创企业和“超级明星公司”。Laura Alfaro 与 Maggie Chen 和 Harald Dinder 合作，将一个表示聚集的连续指标（衡量集聚，而非市场集中）应用于庞大的工厂数据集（Alfaro 等，2019 年）。纵观 2004 年的制造业，他们发现工厂地理分布存在枢纽和辐条结构，规模更大、生产率更高的工厂（通常是跨国公司的一部分）是其他工厂的中心。重要的是，图 1 表明，在欧元区地区，2004 年制造业集聚度上升与 2005 年至 2017

年间平均实际 GDP 增长较高有关。从数量上讲，工厂间彼此距离 50 公里以内的概率增加约 50%，区域年平均增长率会从 1.1% 增加到 1.5%。

图 1 欧元区地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2005-2017 年）和工业集聚（2004 年）



注：纵轴显示 2005 年至 2017 年间欧元区 NUTS2 地区的平均实际 GDP 增长率。横轴显示行业区域级聚集指数。工厂群的聚集指数 i 表明其他工厂（来自同一行业）围绕工厂 i （在一定距离内，在本例中为 50 公里）而不是同一国家/地区和工业的其他工厂周围聚集的相对概率。然后在行业区域级别对工厂级指数求平均值。较高的聚集指数意味着更多聚集。灰线显示不同级别工业区域聚集的预期（有条件）区域增长，基于以下估计值：增长率 = $\beta \times$ 密度 $k,r + \gamma'Xr + \delta k + \varepsilon k$ ， r 表示区域， k 表示行业，密度 k,r 是行业区域水平聚集指数， Xr 代表一组区域控制变量（人均 GDP 水平、人口密度、中等以上教育人口比例和研发支出，均为 2004 年数据）， δk 是一个行业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转载自阿尔法罗等人（2019 年），图表 3。

虽然 Gianmarco Ottaviano（2019）赞同这种聚集的效率和增长效应，但他强调了两个必须加以注意的相关副作用。首先，日益去工业化（“外围”）的地区正在被抛在后面，面临失业和生活水平下降问题。其次，受影响最严重地区的选民转向对当前经济和政治制度提出质疑的民粹主义和右翼政党。例如，Colantone 和 Stanig（2018a, b）分别显示了英国脱欧投票和西欧国家选举的因果关系。总体而言，这些事实与 Baldwin（2016）全球一级的大融合（一些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赶上领先的发达国家）和 Moretti（2012 年）在区域层面的大分化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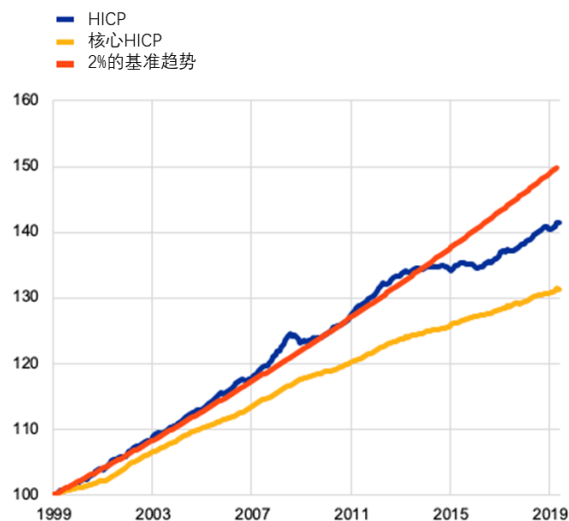
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与 EMU 的完成

在欧元区趋同情况下，下一个问题是整个地区和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是否合适。许多发言者提到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在头 20 年的总体成功，这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通胀锚（如 Baldwin, 2019; Reis, 2019），并显示了欧洲央行在困难情况下采取行动，并在必要时进行创新的能力（如, Boone, 2019; Praet, 2019），包括德拉吉主席在确保欧洲央行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欧元”的领导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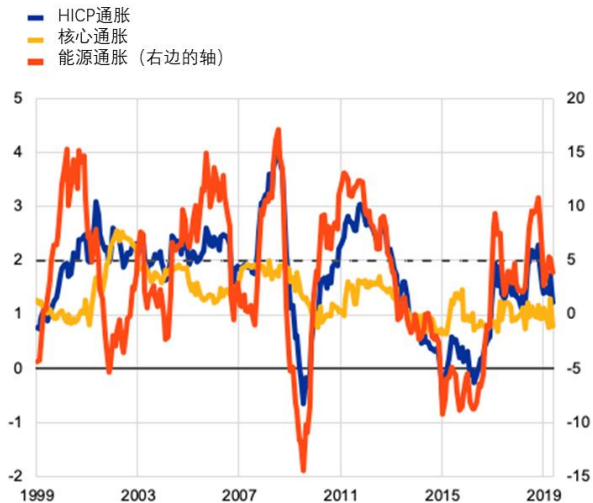
具体而言，Reis (2019) 和 Praet (2019) 的研究显示，在 1999 年至 2013 年间，欧洲央行首选的总体通胀指标基于欧元区消费者物价统一指数，相对接近于欧洲央行的下限目标，但接近 2%（参见图 2）。然而，此后作为主权债务危机后低通胀复苏的一部分，长期的下行偏差出现。根据 Rostagno 等人 (2019) 的研究，Draghi (2019) 和 Praet (2019) 也强调核心通胀（除去能源和食品价格等不稳定因素的 HICP 通胀）自金融危机之前就与总体趋势相比呈下降趋势(图 2)。在油价大幅上行冲击的情况下，总体通胀企稳（参见图 2 图 (a) 中的红色虚线）必然意味着核心通胀的路径较低。除了后来主权债务危机留下的伤疤外，Draghi 和 Praet 认为这可能导致了随后的低通胀环境。此外，为了进一步强调欧洲央行对通胀目标的对称性追求，Praet 建议重新审视以下限目标为准，但接近 2% 的通胀指标，Draghi (2019) 强调，长期低于目标通胀水平之后，未来一段时间内，必须高于目标。

图 2 欧元区总体通胀、核心通胀和能源价格冲击

a) 变化 (同比%)



b) 程度 (指数, 1999年1月为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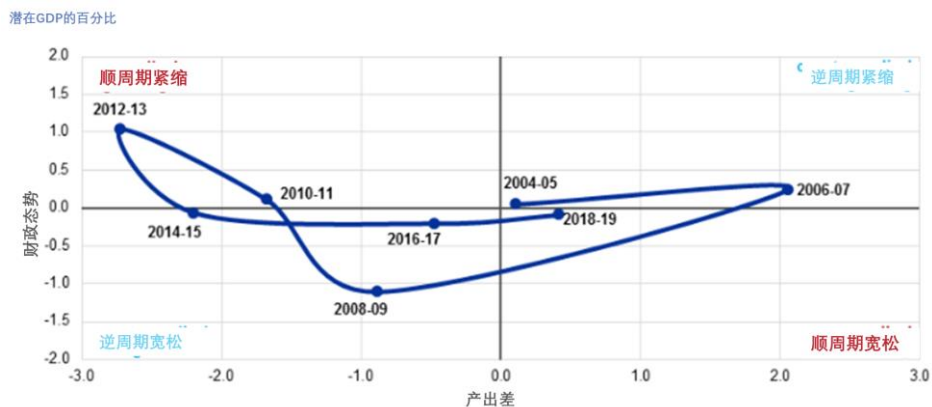


注：核心通胀是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 HICP 通胀。a) 图显示在左侧 y 轴上的是每月 HICP 和核心通胀，右侧 y 轴上是能源通胀。b) 图将 2% 趋势线与实际 HICP 和核心 HICP 水平进行比较。

资料来源：Praet 等（2019），图表 3 和 4。

与此同时，许多与会者似乎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欧元区的宏观经济稳定只有在欧洲货币联盟的其他特征和机构也得到充分设计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运作。这尤其适用于财政领域，而这一领域在欧洲货币联盟中，国家仍然承担主要责任。它将一些共同规则用于个别国家，但是其不完善的运作使欧洲央行承担了货币政策方面过多的稳定性任务，特别是自主权债务危机加剧以来（Draghi, 2019; Praet 2019; Rey, 2019）。图 3 显示了一个极端的例子，2012-2013 年这一宏观经济刺激至关重要的时候，出现了强烈的顺周期财政紧缩（Praet, 2019）。

图 3 欧元区国家财政政策总量周期



注：欧元区财政状况的计算方式为成员国主要余额变化（占潜在 GDP 的百分比）之和。左上（右上）区域表明，这是一段顺周期（逆周期）财政紧缩的时期，而左下（右下）区域则意味着一段反周期（顺周期）财政放松期。

资料来源：Praet 等（2019），图表 16。

更广泛意义上，Laurence Boone（2019）、Hélène Rey（2019）和 Gita Gopinath（2019）对一些中央财政稳定能力表示强烈支持。例如，分散的财政政策意味着对国内形势的关注，以及对积极的跨境溢出效应的忽视（Blanchard, 2019; Boone, 2019）。此外，当缺乏财政空间的国家受到负面经济冲击时，侧重关注个别国家可能导致对整个区域的支持不足。然而 Volker Wieland 指出，这些要求财政集中的呼声与欧元区国家公民投票支持的对象之间存在脱节。欧元集团（2019）于 2019 年 6 月商定的趋同和竞争力预算工具（BICC）不包含稳定功能。

Blanchard（2019）、Reis（2019）和 Rey（2019）也提出了当欧元区国家受到的冲击不一致时，经常账户和相对价格调整的问题。如果增长强劲的成员国保持低通胀和经常账户盈余，增长较弱的国家就更难复苏。他们认为，如果财政空间更大，对通胀增加有更大灵活性的盈余国采取更大的财政刺激措施，那么欧元区的宏观经济稳定将发挥更好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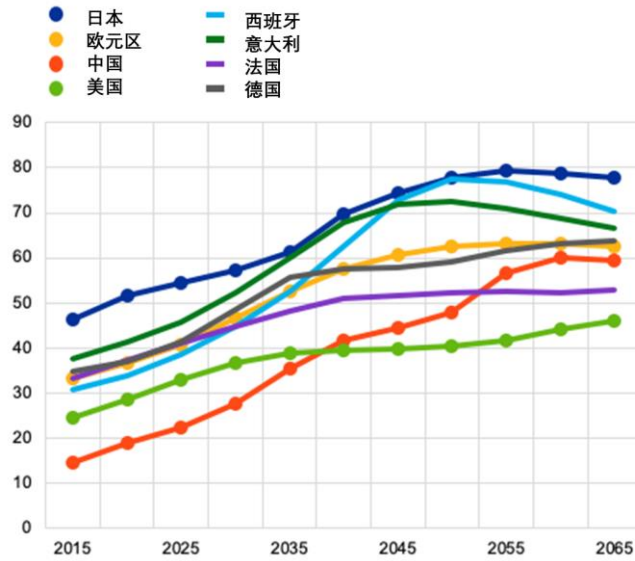
为了改善欧洲货币联盟的财务和审慎性，Boone（2019）和 Gopinath（2019）呼吁欧洲资本市场和银行联盟项目的进一步行动（例如，欧洲存款保险计划）。为了避免在解决欧洲银行业问题时继续“拖延”，Martin Hellwig（2019）认为，银行联盟的首要任务是完善解决机制。然而，只有将足够的行政和立法权力提高到全区域水平，并鼓励国家之间进行公开讨论，才能确保国家银行系统所需干预必要的政治合法性。

人口变化、增长和通货膨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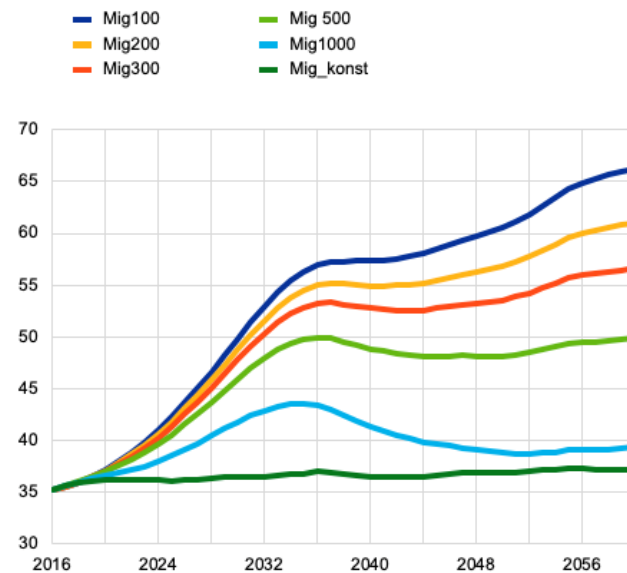
最终，只有成员国经历足够强劲的增长和就业后，EMU 才能取得成功。Axel Börsch-Supan 谈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即人口变化（Börsch-Supan 等，2019）。图 4 图（a）显示，未来 30 至 40 年欧元区人口将大量老化。重要的是，这一进程将在各国间展现出差异性，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老龄化程度预计会大大超过法国。

图 4 老龄化和人口迁移

a) 老年抚养比率预期演变的国际比较（%）



b) 德国老年抚养比率的模拟变化



注：老年抚养比率的定义是 65 岁或以上的人数除以 20-64 岁（被视为工作年龄的人）的人数。图 b) 中的上部彩色线条显示了不同年度净移民指数情况下，德国 2016 至 2060 年抚养比率的模拟演变：Mig100=100000 移民、Mig 200=200000 移民，以此类推。基准线（Mig_konst）表示保持老年抚养比率大致不变的净移民（例如 2016 至 2025 年间，每年约有 150 万移民）。

资料来源：Bürsch-Supan 等（2019），图表 1 和 4。

Bürsch-Supan 等人（2019）使用一般均衡重叠世代（OLG）模型来模拟，发现这种老龄化过程可能使欧元区人均 GDP（近似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三个

最大经济体的总和)在 2015 年至 2030 年间累计减少 8.7%。然而,劳动力市场改革、养恤金改革以及资本、劳动力、货物和服务的国际流动将缓和这种负面影响。例如,实施改革,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两年,将工作进入年龄降低两年,将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提高到男性的 90%,并将失业率降至非加速通胀失业率 (NAIRU) 将几乎完全抑制人均 GDP 的下降。Bürsch-Supan 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以前瞻性的方式积极利用必要的养老金、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改革,并通过在数字化方面进行充分投资,以资本深化促进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与此相反, Bürsch-Supan 认为,合理的移民流(通常是相对年轻的)的直接影响不太可能抵消国内人口的老龄化。图 4 图 (b) 中的上面的线模拟了德国 10 万至 100 万净移民对老年抚养比率的影响(大致相当于退休人员相对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只有绿线 (Mig_konst) 能够消除人口老龄化,该绿线 (Mig_konst) 代表在未来 15 年内平均每年约需要 150 万移民(2021 年达到 210 万的峰值)。鉴于德民众对移民的态度在 2015 年 95 万峰值的难民导致难民危机后出现逆转,这些数字显然不可行。

然而, Anna Maria Mayda (2019) 在讨论中补充说,如果考虑到间接影响,人口迁移对老龄化及增长的影响将更为强烈。首先,移徙者的生育率往往高于本地人。第二,低技能移民可以增加高技能当地妇女的劳动力参与,因为低技能移民往往接管家庭服务(如 Cortes & Tessada, 2011)。第三,技术移民可以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并因此对生产力产生积极影响(如 Hunt & Gauthier-Loiselle, 2010 年)。

对中央银行来说,重要的是人口老龄化也影响通货膨胀;尽管文献对这种关系是负面还是正面没有定论(如 Gajewski, 2015)。Hürtl 和 Leite (2018) 使用计算一般均衡 OLG 模型进行的模拟表明,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同因素导致了法国和德国的反通胀压力(见 Bürsch-Supan 等, 2019, 图 23)。然而,由于德国的老龄化进程比法国更快(见图 4, 图 (a)), 德国的反通货膨胀趋势更为明显,而且在未来十年仍将如此。根据这些结果,欧洲央行工作人员最近估计,长期来看,欧元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正相关 (Bobeica 等, 2017)。

本文原题为“20 Years of 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Selected Takeaways From the ECB’s Sintra Forum”。本文作者 Philipp Hartmann 是 ECP 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Glenn Schepens 是欧洲央行的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9 年 9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对中国关税：你需要知道的 5 件事

Chad P. Bown/文 宋海锐/编译

导读：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有关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摇摆不定的消息一直让人目不暇接，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消费者的困惑。8月13日，政府正式发布了新关税计划，将在今年秋季和冬季逐步生效。推迟推出新关税以避免零售购物旺季的情况，可能表明特朗普总统正计划维持其关税。文章编译如下：

美国政府计划从9月1日起对112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新关税。随后将于12月15日对另一系列产品征收第二轮关税，涉及1600亿美元的进口。归根结底，特朗普的贸易战可能会首次直接提高许多家庭预算项目的价格，如服装、鞋子、玩具和消费电子产品。

显然，特朗普担心这些关税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计划将其推迟至美国零售购物季相关进口高峰过后。例如，12月15日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智能手机、智能手表和视频游戏征收关税，意味着这一关税将错过10月份在假日季节准时抵达码头的进口货物的传统激增。

关于下两轮关税，你需要知道五件事。

1. 贸易战期间，美国对华关税持续上升

特朗普的最新升级将推动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从目前的18.3%升至9月1日的20.0%。关税将在12月15日上调至21.4%。此前，特朗普从2018年1月开始征收关税，一直持续到2019年5月，仅从中国进口就超过2500亿美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特朗普将把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平均关税从贸易战前的3.1%提高18个百分点以上。

三个多月前，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他将“很快”对从中国进口的其余商品征收新关税，而这些商品在当时仍然是免税的。在那条微博之后，美国贸易代表（USTR）分发了一份新关税下的拟议产品清单，称为“3000亿美元清单”，涵盖了2018年从中国进口的约2740亿美元。[2]这些产品将于2019年6月17日至25日举行公开听证会，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进行，该条授权使用关税对贸易伙伴据称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进行报复。

6月29日，特朗普暂时搁置了他5月份宣布的关税。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他在与中国总理习近平主席会晤后，发表了一项临时停火协议。但它是短暂的。8月1日，特朗普再次改弦更张，并表示新关税将从9月1日起生效。

8月13日的公告阐明了细节。这将在9月1日（1120亿美元）和12月15日（1600亿美元）产生新的关税。此外，3000亿美元清单中的20亿美元产品将不会受到新关税的冲击。

2. 9月1日的关税将首次直接影响许多消费品

特朗普9月1日的关税将达到1120亿美元的进口额，而此前这些进口额并没有成为直接目标。鞋类、服装和纺织品占新目标价值的三分之一以上。迄今为止，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服装和鞋子都没有受到影响。

9月1日的行动改变了这一点。受特朗普关税打击的中国纺织品和服装进口份额将突然从10%跃升至87%。而对于鞋类，中国进口的覆盖率将从7%提高到53%。增加的不限于衣服和鞋子。虽然早些时候特朗普的关税只触及从中国进口的所有消费品（即“最终”商品）的29%，但9月1日的关税将这一范围扩大到69%。总的来说，特朗普的关税范围正在扩大。特朗普早前的关税以进口零部件为目标，避免了很多消费品。到2018年9月，特朗普的关税已经覆盖了中国所有进口投入的82%。

进口关税的典型作用是提高价格。对于半导体或钢铁等进口产品，这些税收意味着美国企业用它们来提供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成本更高。由于特朗普迄今的关税主要集中在这些进口零部件上，美国企业发现与其他国家的企业竞争更加困难，而这些企业的投入却没有面临这些关税，因此对美国产生了主要影响。不同的美国公司有不同反应。一些人把更高的成本以更高的价格转嫁给终端消费者。其他人选择赚取较低的利润，或在其他地方削减成本，包括保持低工资。

美国经济受特朗普关税影响的渠道可能会随着9月1日关税而改变。直接对消费品征收关税可能意味着，家庭看到的价格上涨速度甚至比迄今为止的情况还要快。

3. 12月15日的关税将首次直接打击许多消费电子产品和玩具

在特朗普新一轮关税生效的12月15日，产品覆盖范围再次扩大。这些关税将使以前未受影响的中国进口额增加1600亿美元。这份清单上超过三分之二的产品价值包括手机、智能手表、视频游戏机、电脑显示器和圣诞装饰品。

虽然在12月15日之前，从中国进口的玩具中只有18%会受到关税的影响，但关税将突然飙升至100%（图2）。12月15日关税导致中国进口产品覆盖率大幅提高的其他行业包括鞋类（53%至100%）、电子（59%至100%）和机械（64%至100%）。从12月15日开始，美国企业将发现，从中国进口的几乎所有产品类别的100%都成为特朗普关税的目标。

4. 这些关税的适时推出可能是为了避免今年的零售购物高峰

接下来两轮特朗普关税的时机表明，它们旨在等待今年零售采购大幅增长的一部分。进口量的急剧增长传统上是由返校和寒假购物季推动的。

第一个圣诞节和其他 12 月的假期。10 月是美国进口商在 11 月“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囤积玩具和消费电子产品的关键月份，这两天是一年中最大的两个零售和网上购物日。10 月份恰好是 12 月 15 日关税清单上产品的进口高峰月份（图 3）。美国政府可能希望，只有在 10 月份典型的关税激增已经结关之后，才会对这些产品征收关税，这将推迟因关税对消费者钱包造成的部分反弹。

8 月也是 9 月 1 日清单上服装、纺织品和鞋类产品的进口高峰期（见图 3）。如果这些产品的关税在 7 月初生效，从而打击了当时每年发生的进口激增，零售商可能不得不在返校购物高峰期间突然提高价格。总统六月在大阪推迟关税的决定避免了潜在的危机。

5. 从 12 月 15 日开始，几乎所有从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都将被特朗普的关税覆盖

特朗普在 2018 年的贸易行动到当年 9 月 23 日将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覆盖率提高到 50% 以上。仅 2018 年的新关税就导致了过去 40 年来无与伦比的贸易保护覆盖率。

接下来的两轮关税将使受影响产品的覆盖范围几乎翻一番。2019 年 9 月 1 日，对 112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将使产品覆盖率提高至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 68.5%。而 12 月 15 日对另外 1600 亿美元新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将导致 96.8% 的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受到特朗普额外关税的影响。

尽管过去几个月在关税问题上屡屡摇摆不定，但所有迹象都表明，特朗普将继续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这些关税。与他最近对墨西哥和汽车的其他威胁不同，有关中国的证据实际上指向了后续行动。令人有些意外的是，这甚至包括最可疑的竞选承诺，即正式指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他在 8 月 5 日弥补了这一威胁，在面对该国多年来没有干预以降低其货币价值的事实时，他大发雷霆。

这些关税公告中没有好消息。唯一的小小安慰来自他们的时机。特朗普总统推迟了接下来的两轮谈判，直到今年的返校和寒假购物季的进口激增已经到来，这可能是在为他贸易战的成本提供经济证据，尽管这是姗姗来迟。到目前为止，是美国消费者和公司而不是中国承担了他的关税负担。

但伴随着这种解释，还有一个重大的额外问题。以承认其成本的方式推出这些协议，可能意味着特朗普也在计划维持其关税。

本文原题为“Trump's Fall 2019 China Tariff Plan: Five Things You Need to Know”。本文作者 Chad P. Bown 于 2016 年 4 月加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考察了国际贸易法律和制度、贸易谈判和贸易争端。他与 soumaya keynes 共同主持《贸易谈判》，这是一个关于国际贸易政策经济学的每周播客。本文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经济在减速，但不是因为贸易战

Nicholas R. Lardy/文 李陆屿/编译

导读：特朗普称加征关税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首先，美国纳税人承担了关税负担。第二，早在贸易战之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放缓，原因主要是中国的企业政策和去杠杆。中国经济也并不十分依赖对美出口。编译如下：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多次为对中国加征关税辩护，称加征关税不会阻碍美国经济增长，但却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情况非常非常糟糕，”特朗普最近在谈到经济状况时告诉记者，“关税损害了中国经济，但根本不会损害我们的利益”。他断言，中国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北京很快会同意美国的贸易协定条款。

但事实并不支持他的论断。

首先众所周知的是，是美国纳税人而非中国消费者和中国公司承担特朗普加征的关税的负担。总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也推迟了针对一些商品的新增关税，这些商品是美国假日购物季节的畅销商品（如玩具和消费电子产品）。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可能会使 2019 年美国 GDP 增长减少约半个百分点。

但其次，在贸易战开始之前，中国的增长就已经开始放缓（见图）。增长速度已从 2010 年的两位数增长降低至最近一季度的 6.2%。至于贸易战加速中国经济衰退的说法，事实恰恰相反。如图所示，自 2018 年 7 月美国初次征收关税以来，中国经济下行的步伐有所放缓。经济放缓很大程度上将信贷和其他资源分配给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而不是私营企业的政策结果。此外，自 2017 年以来，中国已经减少了整体信贷的增长，以便在企业加杠杆的背景下降低金融风险，这一趋势也使得整个经济增长放缓。

图：中国经济在贸易战前就开始放缓

China's growth began slowing long before the trade war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第三，经过准确的衡量，中国对出口美国的依赖程度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大，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征收关税之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每年达到 5000 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12.25 万亿美元）的 4%，这在理论上很大。事实上，这个百分比并不大。衡量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时，应该衡量增量。国内生产总值用增量衡量；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量以总额计算。中国向美出口商品只能增加 50%，因此出口美国的商品对中国 GDP 的直接贡献约为 2500 亿美元，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

最后，至少在 2019 年 9 月 1 日新的美国关税推出之前，仅有大约一半的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商品受到关税影响。因此，如果这些受关税影响的商品的销量大幅下降，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潜在直接影响甚至可能低于约 1250 亿美元，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这几乎不足以解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现象。

尽管发生了贸易战，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销量并没有因为关税大幅下降。2019 年上半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量下降了约 13%，也就是 300 亿美元。这与 2002 年上半年中国近 7 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有所下降。此外，按百分比计算，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仅仅下降了 10%，这导致了双边贸易不平衡，成为吸引总统的注意力的焦点。

本文的分析没有考虑贸易战的间接影响，包括贸易摩擦可能导致的投资减少，也没有考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在不利影响（如果美国继续限制中国使用先进技术）。但随着贸易战的加剧，特朗普声称自己将轻易取胜。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特朗普坚信当前的困境将迫使中国领导人屈服于美国的贸易要求，这看起来越来越难以实现。

本文原题为“China's Growth Is Slowing, but not Because of the Trade War”。本文作者 Nicholas R. Lardy，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于 2003 年 3 月离开布鲁金斯学会加入该研究所。在加入布鲁金斯之前，他在华盛顿大学任职，担任 Henry M. Jackson 国际研究学院院长。从 1997 年到 2000 年春，担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国际贸易和金融学院的弗雷德里克弗兰克兼职教授，是中国经济专家。本文于 2019 年 8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美货币战争：过去和现在

Steve H. Hanke / 文 张子萱 / 编译

导读：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一项纯粹的政治行动，我们可以认为就汇率问题上，美国在对中国宣战。特朗普总统提高中国关税后，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基本面受到影响，这样看来，操纵汇率的究竟是中国还是美国？当前，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亚洲货币战争。编译如下：

美国在亚洲发动货币战争的历史由来已久，我们都知道此前日本的先例。美国曾声称，美日的不平等贸易使其对日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为了“纠正”所谓的问题，美国干涉日本国内政策，引导日元升值。但这并没有消除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日本对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贡献在 1991 年达到近 60%，而此时日本经济因日元升值，已经几乎陷入通缩泥潭。

今天，美国也和当初一样，毫无根据的指责中国，毕竟当前中国对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贡献率已飙升至 47%。美国并不是第一次将货币作为武器来动摇中国两，上一次发生在上世纪 30 年代初，那时中国仍处于银本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美元的白银价格决定。

在第一任期内，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出了他的稳定人民币汇率的“计划”，这个计划看似是在帮助美国白银生产商以及中国人。罗斯福利用 1933 年托马斯修正案和 1934 年白银购买法中的相关条例购买白银，推动了白银价格在 1932-35 年间上涨了 128%（以年平均值计算）。由于中国当时施行银本位制，白银利益集团断言，白银价格上涨（这将使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将通过提高中国人的购买力让自己受益。

随着白银的美元价格飙升，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结果，中国被陷入了大萧条的深渊。1932-1934 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26%，首都南京的批发价格下降了 20%。

为了摆脱美国白银政策带来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曾寻求修改美国财政部的白银购买计划。但罗斯福政府对这一请求置若罔闻，一直闪烁其词，终于在 1934 年 10 月 12 日表示这只是在执行美国国会授权的政策。10 月 14 日，1 与美协商无望的中国政府被迫放弃银本位，官方声明则推迟到了 1935 年 11 月 3 日。放弃银本位，就意味着蒋介石政府的结束。美国的“计划”很有趣——通过货币扰乱中国经济，这恰好给了共产党一个机会，一个推翻民族主义，振兴中华的机会。

今天，中美的货币战争也将带来一贯的结果：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特朗普总统将不再是 2020 年“和平与繁荣”的候选人，这一点日益清晰。

本文原题为“U.S. Currency Wars with China—Past and Present”。本文作者 Steve H.Hanke 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全球健康与商业企业研究所联合主任。同时他是卡托研究所货币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高级顾问，纽约金融稳定中心特别顾问。本文于 2019 年 8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财富税-议题综述

Alan D. Viard /文 张子莹/编译

导读：财富税是一个在某些欧洲国家存在的税种，但在美国还没有。今年1月，美国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提议对7.5万户财富超过500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财富税。虽然每年2%到3%的税率看似很低，但实际上这相当于高税率的所得税。由于美国财富的不平等分配，财富税的税收规模将会很大，甚至减少国民储蓄和投资；财富税还面临纳税人故意隐瞒资产或压低资产价值的问题；它也将面临合规性和行政挑战，甚至可能被裁定为违宪，因为美国的直接税必须由各州分摊。当前的政策环境下，任何对收入、遗产和赠予有关的税改都必须谨慎。编译如下：

1、财富税税率

尽管财富税2%或3%的税率看似很低，但这只是一种假象。我们要认识到，从沃伦提案的表述中看，财富税的税率是每年2%或3%。对于一个拥有固定财富的家庭，第一年家庭将所拥有财富的2%交税，但累积到第十年，这个家庭将总共支付其财富20%的累计税收。从所得税的角度，对收入的流量征税来思考，十年的财富税相当于第一个十年总收入的20%都是税款，并在这十年支付。

2、累进性和财富集中度

由于美国的财富分配失衡，征收的财富税将是非常累进的。Saez 和 Zucman (2016) 估计，2012年，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42%的国民财富，其中前0.1%的家庭拥有22%的国民财富，前0.01%的家庭拥有11%的国民财富，在过去的三四十年来，上层财富的份额急剧增加。Saez 和 Zucman 估计，沃伦财富税征收对象的那75000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的0.06%，但这些家庭却拥有了10%的国民财富。有人认为，部分财富税负担最终可能导致工资下降，因为部分财富税将转由工人承担，但这部分负担可能不大，财富税的税收仍将保持很高的累进性。

3、所得税下的财富处理

另一种向顶级的财富持有者征税的方法是对他们的资本利得征税。然而，现行所得税规则尚未对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征税，这也是财富产生的主要收入。当一项资产价值上升时，所有者将获得经济收益，即使该收益尚未通过出售该资产实现。在某些情况下，所有者可以通过某些策略，将这种收益转换为现金。然而，在资本真的实现利得之前，政府一般不会对其征收所得税。这减轻了资本所有者的负担，因为明天支付的一美元的价值少于今天支付的一美元。此外，如果所有者在没有出售资产的情况下死亡，其生前的未实现收益将不必缴纳所得税，所有者的继承人将被视为是在所有者死亡之日以其市场价格购买了资产，因此所得税只对资产的溢价征税（如果他们曾经出售资产）。当资本实现利得时，通常按优惠税率征税，股息也同样适用。

4、支出、储蓄和投资

纳税人可以在现在支出和储蓄之间做出选择。财富税会对纳税人的行为产生两种影响。首先，税收将减少纳税人可用的资源，这将导致他们在现在和将来都减少开支。其次，这项税收将通过降低储蓄的税后回报率来减少未来储蓄的收益，激励纳税人现在多花钱，将来少花钱。尽管这两种影响都意味着纳税人未来的支出将减少，但它们对于现在的消费却有着相互矛盾的影响。总的来说，国民储蓄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下降。在支出假设不变的情况下，纳税人的储蓄将随着纳税总额下降。尽管财富税收入可能会减少，但它不会彻底消失。

5、税基

财富税可以有涵盖几乎所有类型资产的税基，也可以对部分资产予以免除。对财富税来说，一个适用面广的税基很重要，它将中立地对待不同的资产。Warren (2019) 呼吁建立一个适用广泛的税基：“所有家庭资产……包括住宅、企业、信托、退休金、未成年子女持有的资产，以及价值 5 万美元或以上的个人财产。”

6、管制规避

根据财富税法案，所有高于免税额的家庭，每年都需要确定所有资产和负债的市公允场价值。银行账户和公开交易的金融资产很容易估值，但非公开交易的资产，如土地、房屋、私人企业、艺术品和家具的估值则很困难。纳税人有动机压低这些资产的估值，甚至非法隐瞒资产。此外，纳税人可能会将其持有的资产转移，例如，一些家庭可能会将其财富转移到国外，因为外国资产可能更容易隐藏。

7、宪法问题

财富税还将面临潜在的宪法挑战。原宪法要求所有直接税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各州，1913 年第十六修正案的提出免除了对所得税的限制。如果各州的人均税负相等，再人均财富较高的州财富税税率将更低。这种利差将是财富税的一个严重缺陷。如果财富税是一种间接税或所得税，那么它就可以免除宪法的分摊要求。

结论：财富税是一种对极端富裕家庭征税的好方法，然而它面临着来自行政和宪法方面的阻碍，要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可能还有其它办法。但我们目前还无法证明打破集中财富的做法会对美国的政治权力分配产生很大影响，即使不给 7.5 万户家庭增加负担，我们依旧可以实现显著的累进性增长。

本文原题为“[Wealth Taxation: An Overview of the Issues](#)”。本文作者 Alan D. Viard 是美国企业研究生常驻学者，他还曾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本文于 2019 年 8 月刊于 AE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货币战争会检验全球经济恢复力

Kevin Carmichael/文 张寒堤/编译

导读：在新版的北美贸易协定当中，添加了“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事宜”。该条款规定任何签署方都不得通过干预外汇市场进行竞争性贬值，如有违犯，则需由受害国与被指控的违反国进行双边协商解决争端。如今美国正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货币战争，如果新版北美贸易协定生效，加拿大和墨西哥将不得不遵循条款内容，做出对中国不利的政策措施。编译如下：

谁能想到新北美贸易协定第 33 章“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事宜”会成为加拿大和墨西哥迅速推动新协议批准的原因呢。在第 33.2 条中，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确认市场决定的汇率是稳定宏观经济调整和促进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基础。第 33.4 条中规定，各签署国应该避免“包括通过干预外汇市场的手段进行竞争性贬值”。如果任何签署方认定另一方有施行与竞争性贬值相关的政策或措施，或将汇率作为竞争目的用途，那么第 33.7 条将允许受害方与被指控的违反国进行双边协商从而解决问题。如果争端依旧没得到解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会介入。

第 33 章可以说是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的一个奇怪补充，因为签署的三个国家都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希望与有干预外汇市场历史的国家进行谈判的先例。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 Stephanie Segal 表示“随着第 33 章的收录，美墨加三国协议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涵盖宏观经济和汇率政策的贸易协定，但其实第 33 章对三国现行政策和做法的实际影响是有限的”。

回顾之前，协定的签署好像是发动货币战争的一个先兆。8 月初，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煽动火焰，对中国发动货币战争，为近年来都相对稳定的市场注入更多的政治风险。通过增加不确定性，特朗普正在测试全球经济对其极不稳定政策的适应能力。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美国前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表示，“市场近几天的过度反应表明了市场的高度警惕，投资者纷纷涌入如债券、黄金甚至比特币等的避险资产，逃离股票、商业贷款等高风险资产。”他在 8 月 6 日的华盛顿邮报上评论道“经济衰退的风险现在可能比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任何时点都要高”。

几十年来，美国政界人士对于其他国家操纵货币价值的抱怨不绝于耳，可对自己掌握着世界上实际交换货币的特权却只字不提。特朗普的前任们选择在国会中管控威胁。在比尔·克林顿执政期间，在任最久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提出

了一项非官方的“强势美元政策”，而在乔治·W·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依然贯彻这一政策。2018年3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会议上，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表示，他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也不会将汇率作为竞争目的用途”，在金融危机后重新达成共识，使得外汇市场稍获平静。G20领导人最近一次在日本大阪举行的峰会上又重申了他们对2018年承诺的支持。

然而，谈到外汇交易时，特朗普和他的官员更像是国会中的反动声音，而非一个温和的经济外交官。2018年1月，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表示“显然美元疲软对我们贸易有利，我们将迎来机遇”，尽管他最终会避而不谈这些言论。今年6月，特朗普在一条推文中指责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故意试图使欧元兑美元汇率走弱。在7月底时，推文的揣度变为现实。白宫证实，美国官方有购买国际货币以使美元贬值的考虑，但特朗普反对这一举措。虽然总统先生在接受直接询问时回答“并不会做出任何行动”，但大约在一周后，美国确实采取一些应对手段。

8月1日，特朗普表示，他将对尚未面临边境税的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8月9日又表示将推迟部分商品的关税，直至12月中旬。中国通过保持人民币升值压力，但却对美元相对贬值的方式进行报复。特朗普政府立即回击，美国财政部通过指控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从而震惊全球金融市场，并且将此案件放在美国法律程序下进行正式审查。财政部在8月5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秘书长努钦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力合作，以消除中国近来造成的不公平竞争优势”。

从那以后，金融市场一直陷于动荡，多家银行分析师都提醒他们的客户做好美国干预的准备。美国最后一次国家干预是在2011年，日本在经历了地震和海啸袭击后，日元遭遇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同削弱。这一举动使美元走强，自2000年财政部及其同行进行干预支撑欧元以来，美国还并未试图削弱过美元。

特朗普的货币战争比他的贸易战更糟糕，他违背了所有的经济逻辑。美元的价值相对较高，是因为美国经济强于绝大多数国家，而且由于关税之争使投资者纷纷涌入以美元计价的安全资产。在美国停止操纵人民币汇率之后，又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国经济一直在放缓，市场力量对货币价值构成下行压力。中央银行利用其外汇储备购买人民币来保值，并且提供市场稳定性。

萨默斯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通过将一种汇率变动标记为中国货币操纵的迹象，是对特朗普政策自然而然的反应，但努钦已经损害了自己及其办公室的信誉。”

财政部的指示一般是象征性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该指示可能并不是美国货币法的起草者所希望的。特朗普政府不是在孤立一个不良行为者，而是将自己不一致和不连续的政策特点完全暴露在全球经济中。货币战争已经蛰伏许久，但现在仿佛要卷土重来，因为每个国家央行都要权衡一下刺激白宫方面所要承担的风险。加拿大总理贾斯丁·特鲁多，前墨西哥总统恩里克·佩尼亚·涅托和特朗普于去年秋天就最新的北美贸易协定进行协商时，没有人谈到有关货币条款的援引。但是现在这些条款引起人们的重点关注，一旦协定获得批准生效，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可能被迫使用它们。

本文原题为“Currency Wars Will Test the Global Economy's Resilience”。本文作者 Kevin Carmichael 为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于 2019 年 8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跨境合作在银行监管中的有效性

Thorsten Beck, Consuelo Silva Buston, Wolf Wagner /文 刘铮/编译

导读：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在银行监管方面的合作力度明显加大，最典型的例子是欧元区实行单一的监管机制。然而，监管合作是否有助于改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目前来说尚不明朗。本文使用大量跨境银行样本的面板数据，检验监管合作是否与银行稳定性的提升相关。研究发现，监管合作是有效的，但对那些给金融稳定带来最大风险的大型银行来说，效果有限。文章编译如下：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大大加强了在银行监管方面的合作。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欧元区实行单一的监管机制，将对大型银行的监管掌握在欧洲央行手中。然而，这种监管合作是否有效，即是否有助于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目前来说尚不明朗。另外，如果合作是有效的，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合作的有效性是取决于监管者所处的环境，还是取决于受监管的银行类型？

各国缔结监管合作协议历史悠久

虽然许多重要的监管合作发生在最近，但近几十年来，各国相互合作已是司空见惯。例如，在一个由 93 个国家组成的集团中，有近 200 项双边合作协议于 1995 年到 2013 年之间签署，此外还有大量的多边合作协议。这些协议的性质各不相同，从共同监管到更有限的合作方式，如信息资源共享协议以及预防和解决危机的联合演习等。这些协议可能是直接的双边协议或是各国多边协议的一部分。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导致几家大型跨境银行倒闭，这推动了监管机构之间达成更多、更密集的跨境合作协议。

为研究合作协议的有效性提供了途径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我们研究了监管合作协议的有效性(Beck 等, 2018a)。大量理论文献论证了国际银行监管合作的潜在好处(见 Acharya 2003, Calzolari 和 Loranth 2011, Carletti 等 2016, Dell'Ariccia 和 Marquez 2006, Goodhart 和 Schoenmaker 2009)。合作会带来更严格的监管，因为监管者会考虑其他国家银行破产的成本。此外，合作还为监管者提供了最新的信息，有助于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也有一些研究认为，监管合作并不必然导致银行业更加稳定(Dell'ariccia and Marquez 2006, Beck 等 2013, Calzolari 等 2018)。例如，放开外资持股银行可能会使国内监管机构过于严格，在这种情况下，监管合作可能降低银行的稳定性(Beck 等, 2013)。此外在实践中，监管机构还面临许多制约因素：它们的法律权力有限，受制于规则制定机构，获取信息不全面，以及面临政治上的压力。

在国际环境下，一些制约因素可能会更加复杂。因此，即使合作协议初衷是好的，也不一定带来更高的稳定性。

如何衡量监管合作的影响？

我们研究了银行层面的监管合作。我们计算了银行监管合作指数，这一指数衡量全球性银行的母、子公司结构受到其母公司所在国和子公司东道国监管机构之间跨境合作的覆盖程度。具体而言，该指数衡量母银行在其子公司中持有的外国资产份额——该子公司东道国的监管机构与母银行所在国的监管机构已经达成合作协议。

由于不同的银行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地理布局各不相同，这些银行层面（监管）的合作指数在一个国家内也有很大差别。将不同的母国和东道国纳入考虑有助于识别合作与稳定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大量跨境银行的样本进行面板分析，我们研究了监管合作程度与银行稳定性之间的相关性，并使用 Z-score 指标来度量——这是一种基于会计的违约可能性度量方法。

监管合作是有效的——除了特别大型的银行

我们发现监管合作在经济上有很大效果。例如，银行层面监管合作强度上一个标准差提高，能使银行的 Z-score 提高 24%。这一结果对于工具变量法（该方法缓解了人们对监管合作内生性的担忧）是稳健的。

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在跨境银行样本中，这种相关性集中在较小的机构。这可能是因为大型银行更为复杂，因此更难监管。与此一致，我们发现，对于子公司数量较多的银行，银行监管的效果较差。我们还发现了出现这样关系的证据——跨国监管合作对稳定性的影响效果随着跨国合作协议涵盖的母银行外国资产所占份额增加而增强。

影响途径是资产风险

以小银行为样本，我们发现监管合作与银行稳定之间通过资产风险相联系，这与资产风险难以观察和控制的观点相一致。因此，密集的合作和信息交流能产生显著的效果。相比之下，银行杠杆率（也会影响 Z-score）并没有通过合作得到改善。这可能是因为现有（国际）法规（如资本充足率标准）已经很好地涵盖杠杆率，因此受监管合作的影响较小。

监管和金融体系的影响

我们还发现，监管的有效性受到一国监管和金融体系特点的影响。首先，当母公司所在国和子公司东道国监管机构都更严格时，监管效率更高。第二，当母公司所在国监管机构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信息时，监督的有效性也更高。第三，

在外资进入限制较少的情况下，监管合作更加有效。这反映出外资银行数量减少可能会导致监管关注度降低。

合作与危机

一个潜在的担忧是，监管合作在正常情况下是有效的，但在最需要合作的危机期间这种合作却可能会破裂。但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监管合作在降低银行风险方面仍然有效，而且影响可能变得更大。

政策建议

我们通过分析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几个重要建议。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原则上应该欢迎更多的监管合作，这有利于改善银行业稳定性。然而，要使合作发挥作用，监管机构需具备适当的制度条件，例如，拥有足够的权力和获取高质量信息的途径。此外，合作的有效性随着银行规模的增加而下降，反映了对复杂机构进行监管更加困难的现实。这带来了监管合作的一个重大不利因素，因为大型机构对金融稳定构成的风险最大。

本文原题为“The Effectiveness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 Banking Supervision”。本文作者 Thorsten Beck 是卡斯商学院银行与金融学教授，CEPR 研究员，Consuelo Silva Buston 是智利卡托利亚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Wolf Wagner 是鹿特丹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本文于 2019 年 9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英国议会休会与脱欧进程

Heather A. Conley 和 Donatienne Ruy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8月28日，鲍里斯·约翰逊首相正式向女王提出申请，要求英国议会进入长达一个多月的漫长休会期，这一提议迅速引起了轩然大波。这项提议意味着什么？英国能否在期限到来之前完成无协议脱欧？作者给出了分析。全文如下：

8月28日，英国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向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正式提交申请，请求她批准将本届议会由九月的第二周开始休会五周。尽管英国议会此前也经历过多次休会，但鲍里斯此次提出的休会依然堪称是史无前例的。一般来说，之前的议会休会期通常仅为期数日，而此次休会则是1945年以来最长的一次。此外，以往的休会通常是出于程序性的考虑，议会可以利用这段短暂的休会期总结之前的议程，并筹划下届的立法安排。而本次休会的首要目的，则是为了在脱欧截止日期到来之际，阻止议会就这一问题推动任何法案。在鲍里斯向女王提出这一申请时，议会下院正处于夏季休假状态，并原定将于9月3日开始恢复运行。鲍里斯的这一提议迅速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此，笔者就各界最为关心的五个问题加以探讨：

问题 1：鲍里斯究竟试图达成何种目的？

显然，这项极端提议的首要目的在于阻止议会对英国无协议脱欧进程的任何干扰。巧合的是，就在鲍里斯做出这项决定的前一天，反对党的领导人们刚刚就通过立法手段阻止无协议脱欧的具体策略达成了一致。通过立法手段，议会可以强制性要求英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申请，延长原定于10月31日的无协议脱欧大限，而这是鲍里斯所绝不愿意看到的。在本届政府看来，这种果断的决策是为了更高效地推动落实新任首相的政策目标。但讽刺的是，这很可能迫使反对党议员们放弃原有计划，并转而通过更加激进的方式（例如不信任投票）迫使首相下台。

问题 2：女王对休会提议持何种态度？

按照惯例，女王不会拒绝由政府呈交的政策建议，但同时这也意味着王室被卷入了脱欧辩论之中。工党党首 Jeremy Corbyn 和自由民主党 (Liberal Democrat) 党首 Jo Swinson 都曾向女王写信，力劝其不要批准这一请求。目前，女王已经批准了首相的提议。因此，英国议会将于9月9日至10月14日间进入休会状态。

问题 3：那么之后会发生什么？

从各种意义上讲，鲍里斯的这一极端举动都堪称是史无前例的。在如此关键的历史性时刻，鲍里斯的做法相当于把英国这艘大船引入了一片未知水域，并使得国家陷入了名副其实的宪法危机。以议会下院议长 John Bercow 为首的多名议员发表联合声明，指责首相的做法“践踏宪法”，并且是“极为不民主的”。此外，反对党也正在筹备全国性的大型抗议活动，并寻求其他法律渠道阻止鲍里斯的企图。我们预计 9 月 3 日议会复会后，工党和其他反对派将对鲍里斯政府发起不信任投票。

问题 4：那么议会选举是否可能提前？

在 2011 年，议会下院通过了《议会固定任期法案》（Fixed Term Parliament Act, FTPA）。根据这项法案，议会选举定于每届议会第五年五月的第一个周四举行，这意味着选举应于 2022 年 5 月举行。但是，这项法案也预留了一些模糊空间，这意味着在两种情况下可以提前举行选举——一是在三分之二以上议员同意的情况下；二是在针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通过的情况下。一旦不信任投票得以通过，议会将有 14 天时间产生新一届内阁，或是在多数议员同意的前提下重新任命旧的内阁成员。如果 14 天之后议会依然无法达成一致，议会选举即将提前举行。如果反对党真的在 9 月初提出不信任投票并获得通过，那么按照所有法定流程，这次选举可能发生在 10 月 31 日脱欧大限前后。

问题 5：如果提前举行选举，谁最可能成为最大赢家？

目前来看，鲍里斯和他的保守党班底拥有可观的优势——鲍里斯本人不仅有丰富的选举经验，他领导的政府也承诺在医疗、教育和加强执法等领域投入大量资源。目前，保守党大约拥有 30% 的支持率，而工党和自由民主党则各有 20% 左右。值得注意的是，由 Nigel Farage 领导的脱欧党（Brexit Party）目前拥有 15% 的支持率，而在三个月前，这一数字还仅仅是 7%。目前来看，鲍里斯试图以强硬的脱欧姿态赢得更多支持，但在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一切都是不可预知的——比方说，在两年前特蕾莎·梅首相决定举行议会选举前，民调显示保守党以 18 个百分点的优势遥遥领先，但在选举后，保守党却意外地丢掉了议会的多数席位。因此，之后的事态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

本文原题为“Suspending the British Parliament and the Brexit Debate”。本文作者 Heather A. Conley 是美国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SIS）欧洲项目主任。Donatienne Ruy 是 CSIS 欧洲项目研究员。本文于 2019 年 8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EI) 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

简介：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于1943年创立，原名美国企业协会（American Enterprise Association），1962年改为现名。到70年代将其研究的范围扩大，包括政治、经济、外交、防务、能源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大量出版、发行其研究成果，广泛宣传其主张，陆续与三百所大学建立了协作关系，每周举办“公共政策论坛”电视节目，在全国四百个电视台播放，竭力扩大其影响。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美国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

网址：<http://www.aei.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p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简介：该机构建于1962年。创始人是前海军作战部部长阿勒·伯克海军上校、尼克松政府助理国务卿戴维·阿布希尔和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查德·艾伦。该中心以维护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主张强硬路线为宗旨，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之称。主要研究政治与军事、国际资源、对外政策和第三世界问题。现有研究员人员200多人。在《2017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7）中，CSIS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5名。

网址：<http://www.cato.org/>